

论明代南京乡试对 南京旅店、娱乐、图书业的影响

刘明鑫

内容提要 明代南京乡试总应试人数至少应为112328余人,平均每科应试人数至少应为3209余人,再加应试者所雇随从,每科南京乡试带来的流动人口自然十分庞大。这些人口以三年为循环周期,不断为南京旅店、娱乐、图书业带去大量消费和商机,对明代南京经济的发展、兴盛与繁荣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这又反过来为士子的备考和乡试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彼此互动中,得以不断发展。

关键词 明代 南京 乡试 应试人数 经济影响

刘明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350007

南京乡试在明代各直省乡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南京自洪武三年(1370)至崇祯十五年(1642)共举行90科乡试,录取举人至少应为11726名,占明代举人总数(至少应为103073名)的11.38%^[1];平均每科至少录取130人,位居全国榜首^[2]。相比南京每科乡试录取人数,其应试举子及其随从人员的数量则更为庞大,是其几倍甚至数十倍之多。这些外来流动人口以三年为循环周期,不断为南京旅店、娱乐、图书等业带来了大量生活消费和商机,对南京经济的发展、兴盛与繁荣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南京乡试的应试及其随从人数

首先,南京乡试的应试人数。为弄清其应试规模,笔者对南京自洪武三年至万历三十一年共35

[1]各科举人数取自郭培贵:《明代各省乡试录取额沿革表》与《明代全国乡试不拘额数录取时期录取举人数统计表》(详见其《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5-372、375、379页)。

[2]明代各直省平均每科录取人数从多到少分别至少应为:南直130人、北直119人、江西101人、浙江93人、湖广89人、福建88人、河南78人、广东75人、山东74人、四川72人、山西65人、陕西62人、广西52人、云南42人、贵州34人(各直省举人数取自郭培贵:《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365-372、375页;各直省乡试科数取自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科乡试的应试人数进行了统计,兹列表表示之:

明代南京若干科乡试应试人数统计表^[1]

科年	应试人数	资料来源 ^[2]	科年	应试人数	资料来源
洪武三年	133人	宋濂:《文宪集》卷五《庚戌京畿乡闾纪录序》 ^[3]	嘉靖七年	3100余人	《嘉靖七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洪武二十六年	800人	陈子龙、徐孚远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九《应天府乡试小录序》 ^[4]	嘉靖十三年	3600余人	《嘉靖十三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洪武二十九年	1000余人	陈子龙、徐孚远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九《京闾小录后序》 ^[5]	嘉靖十六年	4500余人	《嘉靖十六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建文元年	1500人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二《京闾小录后序》 ^[6]	嘉靖十九年	4400余人	《嘉靖十九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7]
永乐九年	1300人	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一《京闾小录序》 ^[8]	嘉靖二十二年	4500余人	《嘉靖二十二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宣德七年	1300余人	李时勉:《古廉文集》卷四《应天府乡试录序》 ^[9]	嘉靖二十八年	4500余人	《嘉靖二十八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景泰元年	1600余人	《景泰元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嘉靖三十一年	5030余人	《嘉靖三十一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成化元年	近2000人	邱濬:《重编琼台稿》卷九《应天府乡试录序》 ^[10]	嘉靖三十七年	5000余人	《嘉靖三十七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成化四年	2000余人	《成化四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嘉靖四十三年	3375人	《嘉靖四十三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成化七年	2300余人	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二〇《应天府乡试录序》 ^[11]	隆庆元年	4000余人	《隆庆元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成化十年	2300余人	《成化十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隆庆四年	4300余人	《隆庆四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成化十三年	2500余人	《成化十三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万历元年	4500余人	《万历元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成化十六年	2700余人	《成化十六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万历四年	4400余人	《万历四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弘治五年	2300余人	《弘治五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12]	万历七年	4600余人	《万历七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1]郭培贵教授考证和统计了南直25科科考录取数,详见其《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笔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10科,共为35科。按:科考录取数即为乡试应试数。

[2]凡未作注者,均取自《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宁波出版社2010年版,影印本。

[3][明]宋濂:《文宪集》卷五《庚戌京畿乡闾纪录序》载该科乡试“来试者一百三十有三”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局1986年版,第362页)。

[4][明]陈子龙、徐孚远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九《应天府乡试小录序》载该科乡试,“衣巾笔牒而至者八百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3页)。

[5][明]陈子龙、徐孚远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九《京闾小录后序》载该科乡试,“太学暨畿甸郡县士至者千余人”,第63页。

[6][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二《京闾小录后序》载该科乡试,“集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5册,第380页);〔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9《京闾小录一卷》,《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7]《嘉靖十九年应天府乡试录序》,《明代登科录汇编》第9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影印本,第4798页。

[8][明]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一《京闾小录序》载该科“就试之士凡千三百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页)。

[9][明]李时勉:《古廉文集》卷四《应天府乡试录序》载,该科应试者有“千三百余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714页)。

[10][明]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九《应天府乡试录序》载,该科“就试之士凡二千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8册,第177页)。

[11][明]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二〇《应天府乡试录序》载,该科应试者为“二千三百有奇”(《四库未收书辑刊》集部第5辑第1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53页)。

[12]《弘治五年应天府乡试录序》,《明代登科录汇编》第4册,第1654页。

弘治十四年	近4000人	陆深:《俨山集》卷六二《前承德郎刑部主事张君墓志铭》 ^[1]	万历十年	4900余人	《万历十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正德五年	4140人	《正德五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万历十三年	5100余人	于慎行:《穀城山馆文集》卷一〇《应天乡试录叙》 ^[2]
正德十一年	2650人	《正德十一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万历三十一年	6000余人	陶望龄:《歇庵集》卷三《癸卯应天乡试录序》 ^[3]
正德十四年	2000余人	《正德十四年应天府乡试录序》	合计	112328余人	

由上表可知,洪武三年庚戌至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共35科有应试人数记载的应天乡试,其应试人数总规模为112328余人,平均每科应试人数为3209余人。分阶段看,洪武至景泰时,南京乡试平均每科应试人数为1090余人;成化至正德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达2626余人;嘉、隆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激增为4210余人;万历时,平均每科应试人数更是高达4917余人。可见,随着时间推移,南京乡试应试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万历三十一年还首次突破6000人大关,达到最高值。

其次,应试者的随从人数。每到南京乡试年,因士子往往会携带衣物、书籍等行李赴试,故需雇佣一定数量的仆从、挑夫、马夫等随从人员;但因士子家庭经济条件、路程远近等因素的影响,每位士子雇佣的随从人员又多寡不一,有只身一人赴试者,有雇一名随从赴试者,有数人共雇一名随从者,还有雇两名甚至更多随从赴试者。如南直华亭人唐祯,读书备考南京乡试时,“止以一仆自随,清苦如寒士,不数年而学成,以金山卫学生领成化癸卯(十九年,1483)乡荐”^[4]。又如南直松江府人陆楫,嘉靖十三年(1534)赴试南闱时,其父陆深在家书中对其嘱咐道:“往丹阳,上陆路,顾一女轿,多备一二夫,力抬之。”^[5]综上可知,应试者的随从人员也应是一个不小的规模,其对沿途及其南京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作用,但由于文献缺载,我们已无法弄清其具体数量。

通过以上研究,笔者得出平均每科南京乡试所带来的应试举子为3209余人,再加上应试者所雇随从,南京乡试产生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惊人,规模庞大。这些人口以三年为循环周期,持续为南京带去大量的消费人口,为南京旅店、娱乐、图书等业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大量商机。

二、南京乡试下的旅店业

在乡试的影响下,南京出现了各种大小小可供应考士子租赁的旅店,其中常见者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河房。秦淮河房集住宿、交际、娱乐于一体,功能多样,吸引了绝大部分士子。正如明末清初人张岱所言:“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6]每到乡试年,南京河房主们纷纷对其经营的河房进行修整、装饰,以图吸引更多的客源,赚取更高的赁金。正如崇祯时人吴应箕所说:“过学官,则两岸河房鳞次相竞。其房遇科举年则益为涂饰,以取举子厚赁。”^[7]像这样经过涂饰的河房很多,最著名者有瓜州余家河房,此房“亭台宽敞”,“庭前有白木槿可观,后亦残废”;贡

[1][明]陆深:《俨山集》卷六二《前承德郎刑部主事张君墓志铭》载,该科“就试者几四千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8册,第392页)。

[2][明]于慎行:《穀城山馆文集》卷一〇《应天乡试录叙》载,该科应试者为“五千一百有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7册,第407页)。

[3][明]陶望龄:《歇庵集》卷三《癸卯应天乡试录序》载,该科应试者为“六千人有奇”(《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5册,第229页)。

[4][明]顾清:《东江家藏集》卷四一《礼部郎中西园唐君墓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1册,第841页。

[5][明]陆深:《俨山集》卷九六《江西家书十一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8册,第621页

[6][明]张岱:《陶庵梦忆》卷四《秦淮河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0页。

[7][明]吴应箕:《留都见闻录》卷下《河房》,南京市秦淮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4年,第20页。

院南岸还有齐王孙河房,此房“垂柳成荫,最宜消夏”;此外,“又有新构者,其墙其峻”^[1]。《儒林外史》也载:“河对面一带河房,也有朱红的栏杆,也有绿油的窗隔,也有斑竹的帘子,里面都下着各处的秀才,在那里哼哼唧唧的念文章。”^[2]可见,乡试应试士子及其随从的数量不仅直接影响着河房客源的充足程度,更直接影响着河房的数量与质量。

秦淮河房数量究竟有多少,现已不得而知。崇祯时人吴应箕在其《留都见闻录》中仅记载了南门桥南岸住家,翔鸾坊蔡弁,武定桥北岸王氏、梅氏,文德桥徐府,瓜州余家,贡院南岸齐王孙,青溪黄公祠,金陵栅口五柳居,桃叶渡山东王户部,淮清桥南岸总督书办,钓鱼巷内监王孙,近水关丁郎中、黄户部,大中桥南和伯等 10 余处较著名的河房^[3]。其中,关于淮清桥南岸河房,《儒林外史》载道:“当下走过淮清桥,迟衡山路熟,找着房牙子,一路看了几处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东水关。这年是乡试年,河房最贵,这房子每月要八两银子的租钱。”^[4]每月赁金高达八两,对于一般寒士,自然很难承受。为了减少租赁费用,大多寒士会选择合租,如万历四十年(1612)六月,叶绍袁赴南都乡试时,“季若往句曲就遗才试,亦至都下,共居河房”^[5]。

其二,普通房舍。乡试年分,由于赴试南京的举子及其随从人员极多,城中有经济头脑者往往会把自家幽静的书室租予举子,以图取利。如《欢喜冤家》第二十回载道,万历十九年(1591)乡试,金陵王谓家“厅堂高敞,房屋深广,后有花园极精。书室每科租与乡试举子,常收厚利”^[6]。比起城中其他地区的房舍,贡院附近的房舍则异常紧俏。《欢喜冤家》第十回载道,扬州府仪真县秀才许玄,“搭船到南京应试”,“初一日到了南京,径往贡院前来寻下处。家家歇满,再无寻处”^[7]。

其三,寺庙、道观等处。如江阴人张畏岩,“积学工文,有声艺林,(万历)甲午南京乡试,寓一寺中”^[8]。天启元年(1621)辛酉,吴江人叶绍袁赴试南闱,“寓朝天宫,武进陶嘉仲(嘉祉)寓白道士家,居相近也,遂成相知”^[9]。天启四年(1624)甲子,叶绍袁再赴南京乡试,“七月下瀚,同季若抵南都,寓朝天宫白道士家”^[10]。天启四年,武进入庄恒赴试南闱时,“同吕海日寓天界寺,仍未售”^[11]。崇祯六年(1633)癸酉,武进入郑珏赴南京乡试,其父郑鄮“偕之行,寓神乐观”^[12]。南直一位秀才赴试南京时,亦“赁僧房读书”^[13]。士子们选择寺庙道观作为自己的寓所,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此类寓所环境优雅,不易受外界打扰,士子们可以专心备考。其次,河房、旅舍等傍近贡院的寓所供不应求,士子们不得不在寺庙、道观等处落脚。再次,此类寓所远离市区,所以比起考场附近旅舍,其赁金相对较低。

其四,伎馆。如松江华亭县学生周立勋,崇祯十二年(1639),“就试金陵,质素清羸,寓伎馆”^[14]。

[1][3][明]吴应箕:《留都见闻录》卷下《河房》,第20页,第19-21页。

[2][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公子妓院说科场家人苗疆报信息》,〔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58页。

[4][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夫妇游山迟衡山朋友议礼》,第202页。

[5][10][明]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0册,第400页,第412页。

[6][明]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二十回《杨玉京假恤独怜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

[7][明]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十回《许玄之赚出重囚牢》,第142页。

[8][明]袁黄:《游艺塾文规》卷一《谦虚利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18册,第20页。

[9][明]叶绍袁:《年谱别记》,《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0册,第519页。

[11][清]庄恒:《声鹤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6册,第197页。

[12][明]郑鄮:《天山自叙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1册,第244页。

[13][明]周辉:《续金陵琐事》卷下《书低》,《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4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777页。

[14][清]朱竹垞著,姚柳依编:《静志居诗话》卷二一,《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⑧》,〔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220页。

三、南京乡试下的娱乐业

历经长途奔走而顺利抵京的乡试举子,除了有食宿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为此,相当一部分士子借机纵酒狎妓,征歌选曲。正如崇祯时人吴应箕说:“南京故都会也,每年秋试,则十四郡科举士及诸藩省隶国学者咸在焉。衣冠阗骈,震耀衢术。豪举者挟资来举,酒呼徒,征歌选妓,岁有之矣。”^[1]兹举数例,以见其概。如闽县人林景清,成化十五年(1479)冬,“以乡贡北上,不第,归过金陵”^[2],与秦淮名妓邵三相狎,“饮于瑶华之馆”;后景清又“以邵三为介”,拜访另一名妓杨玉香,双方“一见交欢”^[3]。又如《三刻拍案惊奇》载道,弘治年间某科乡试后,陆容的乡试同年“有在新院耍,也有旧院耍,也有挟了妓女在桃叶渡、燕子矶游船的,也有乘了轿在雨花台、牛首山各处观玩的”^[4]。此处虽是小说中的情节,但其描述的乡试中式者到南京各处妓院消遣与娱乐的现象应大致符合当时实际。又如太仓监生张氏,“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至南都应试,与院妓情好甚暱,张约倘得中式,当为赎身,妓亦愿从良,盟誓颇坚”^[5]。以上例子可知,无论是应试者,还是中式者或落第者,都因试前之压、试后之喜或郁,产生出强大的消费需求和欲望,为数量众多的青楼、灯船带去了充足的客源,为南京娼妓、歌伎等娱乐业的发展与繁荣创造出巨大商机。

首先,南京娼妓业。南京娼妓业繁华之地应属秦淮地区。如崇祯九年(1636)乡试,嘉兴人姚瀚,就在秦淮,用十二楼船“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6]。水上两岸人家,更是“悬桩拓梁为河房、水阁,雕栏画槛,南北掩映。夏水初阔,苏、常游游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阗骈,阁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觑为景。盖酒家烟月之趣,商女花树之词,良不减昔时所咏”^[7]。《金陵览古》也载,两岸“楼台分峙,亭榭参差,每夏、秋时,士女竞集,画帘锦幙,麝馥兰薰,火树银花,光夺桂魄。吴船载酒,鼓吹喧呼,或爱深绿水,或长歌阳春”^[8]。秋季正值乡试大典举行之时,士子消费对娼妓业的促进作用可见一斑。

秦淮两岸青楼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旧院。旧院即富乐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每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9]。乡试应试举子强烈的消费需求,使旧院周围出现并兴起了数量众多的私营妓家。据《板桥杂记》载:“妓家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香一室;停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擲笛搥箏,梨园搬演,声彻九霄。李、卞为首,沙、顾次之,郑、顿、崔、马,又其次也。”^[10]到了明中后期,此处还出现了“盒子会”。期间,“色业俱优”的院妓,“或二十三十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节以春槩巧具,骰核相赛”,“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来挟金助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11]。

与旧院一样,秦淮两岸的河房亦是考生们喜爱的狎妓之所。如《续板桥杂记》载,“贡院与学宫毗

[1][明]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七《国门广业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8册,第558页。

[2][清]朱彝尊:《明诗综》卷九九《杨玉香一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0册,第917页。

[3][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六《明·林景清》,《续修四库全书》第1702册,第247页。

[4][明]梦绝道人、西湖浪子:《三刻拍案惊奇》第三回《情词无可逗 羞杀抱琵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5][明]周玄暉:《泾林续纪》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24册,第216—217页。

[6][清]余怀:《板桥杂记》卷下《轶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3册,第351页。

[7][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2页。

[8][清]余宝硕:《金陵览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313页。

[9][10][清]余怀:《板桥杂记》卷上《雅游》,《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3册,第329页,第326—327页。

[11][明]周辉:《续金陵琐事》卷下《盒子会词》,《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40号,第784—785页。

连,院墙外为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宾兴之岁,多士云集,豪华者挟重货,择丽妹侨寓焉。寒素之士,时亦挈伴闲游,寻莲访藕,好风引梦,仙路迷人,求其独清、独醒,殆什无二三也”^[1]。在乡试及其所带来的外来人口的作用下,秦淮河房“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客团扇轻纨,缓鬓倾髻,软媚著人”^[2]。清人余怀也说:“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客称既醉,主曰未晞。游楫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3]。

其次,南京歌伎业。秦淮灯船歌伎业作为南京娱乐业的一道亮丽风景,被时人誉为“金陵一奇”^[4]。关于灯船卖唱的盛况,《板桥杂记》载道:“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一到薄暮,水中“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槳击鼓,蹑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5]而舟中更是“黻钺星饶,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6]。推动灯船歌伎业兴盛的重要原因应是数量众多的应试举子们的热情光顾。正如万历时人锺惺在《秦淮灯船序》所说:“小舫可四五十只,周以雕槛,覆以翠幙,每舫载二十许人,人习鼓吹,皆少年场中人也。”^[7]

四、南京乡试下的图书业

乡试在促进南京城房舍租赁、娱乐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内图书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南京书坊或书肆不断出现和增多,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纷纷刊印和推销时文制艺。据张秀民先生考证和统计,南京书坊有93家之多^[8],张献忠先生在此基础上,又考证出几十家,共计“150家左右”^[9]。为迎合士子消费需求,这些书坊或书林纷纷刊印和推销专门阐述解题技巧和命题趋势的时文制艺,赚取高额利润。如周曰校万卷楼书坊,该坊于万历年间刻有《新刻举业卮言》、《新刊举业利用六子拔奇》、《新刻沈相国续选百家举业奇珍》等举业用书^[10]。又如李潮聚奎堂书坊,该坊于万历年间刻有《新镌十六翰林拟纂西戌科场急出题旨棘围丹纂》^[11]。再如三山书林、余氏自新斋、叶贵近山堂、张少吾书林、周崑冈书林、唐氏富春堂、唐振吾广庆堂、周竹潭嘉宾堂等南京书坊或书林也刊印了大量的举业用书。

南京书坊或书林为求时文的易售和速售,最常用的技巧便是利用书名或款识广告,作宣传和推销。如嘉靖四十四年金陵南冈郭良材刻本《金陵新刊古今名儒论学选粹前集》二卷《后集》三卷,其款识为“壬戌进士湛泉赵睿精选,己酉文魁一山赵世卿批点,南冈郭良材繡梓,东浙野樵王林仿录”^[12]。又如万历十九年金陵魏卿刻本《新刻三状元评选名公四美士林必读第一宝》四卷,其款识为“状元养淳朱国祚、抑所唐文献、从吾焦竑全选,金陵对廷魏卿梓行”^[13]。再如万历二十八年余氏自新斋刊本《鼎

[1][清]郑澐若:《虞初续志》卷一一《续板桥杂记》,《笔记小说大观》第14册,〔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页。

[2][明]张岱:《陶庵梦忆》卷四《秦淮河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1页,第31页。

[3][清]余怀:《板桥杂记》卷上《雅游》,《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3册,第327页,第327页。

[4][明]锺惺:《翠娱阁评选锺伯敬先生小品》卷一《秦淮灯船赋有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8册,第298页。

[7][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三三《秦淮灯船序(锺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6册,第168页。

[8]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页。

[9]张献忠:《明代南京商业出版述略》,《明史研究论丛》第十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10]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第三卷,〔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8-19页。

[11]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第二卷,第30页。

[12][13]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0页,第587页。

镌金陵三元合选评注史记狐白》，其题款为“会元霍林汤宾伊精选、状元兰隅朱之蕃详注、解元兰谷龚三益摭评”^[1]。上述时文纷纷用“新刊”“新刻”“鼎镌”“新镌”等字样作书名，其目的无疑是增加时文新鲜感，实现“速售”。正如清人永瑆所说：“盖坊贾以原刻习见，改新名，以求速售。”^[2]而用“进士”“文魁”“状元”“会元”“解元”等字样作题款，则是为增强时文权威性和吸引力，扩大销路。另，严重的翻刻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文出版业的盛况。如金陵书林张少吾出版的《新刻乙丑科华会元四书主意金玉髓》，其扉页就刊有“新刻会元华芳侯先生四书主意金玉髓，房师杨太史订正，翻刻者千里必究”的版权警示语^[3]。

除利用书名或款识广告外，书坊还利用封面广告，进行销售宣传。如三山街蔡益所书坊“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4]。为推销经过“严批妙选，精刻善印”的时文，该坊常在其门口廊柱上张贴封面广告，借以招揽生意。如在一部名为《复社文开》的时文封面上，左边印有“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癸未（崇祯十六年，1643）房墨合刊”；右边印有“陈定生（陈贞慧）、吴次尾（吴应箕）两先生新选”^[5]。陈贞慧、吴应箕既为复社核心成员，也是时文编选名家，经过名家编选，举子们自然争先抢购。蔡益所与复社成员交往，固然可以扩大时文选本的影响力，达到宣传效果，但也因此得罪了官府。在坊官将蔡益所捉拿到案后，官员对其讯问道：“你刻什么《复社文开》，犯法不小。”蔡益所答道：“这是乡、会房墨，每年科场要选一部的。”^[6]从其回答中，我们可清楚地知道当时房墨选本销售的火热状态。

其次，南京集会的文社也常在乡试期间选刻时文。如崇祯三年（1630）乡试后，国门广业社成员集会于南京，“裒诸聚者之文而刻之”，“并其文而广之”^[7]，名曰《国门广业》。此书与《国表》、《南彦》等图书“俱纸贵国门”^[8]。

余 论

其一，乡试带来的外来人口在推动南京旅店、娱乐、图书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交通运输和城内酒馆、茶社等业的发展，故乡试应试人口经济影响的范围比较广阔。如南直松江府人陆楫，嘉靖十三年（1534）赴试南闱，其父陆深在家书中对其嘱咐道：“往丹阳，上陆路，顾一女轿，多备一二夫，力抬之。行李盘用，江行载入城，顾一阔头船，甚为方便，不可于此等处惜费。”^[9]从其叙述中，我们可知，乡试应试者及其随从人员极大刺激了当时马、驴、车、轿、船等水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此外，乡试应试人口还推动了城内酒馆、茶社等业的发展。如崇祯十二年（1639）乡试，国门广业社借机集会于南京，其成员“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10]。又如明代后期人称：“京师（南京）为五方所聚要，皆贸易迁徙之民及在监游学之士而已。”^[11]再如明末人施沛提及南京中城时说：“凡勋戚、乡绅、士夫、青衿及名流

[1]《鼎镌金陵三元合选评注史记狐白》，明万历二十八年余氏自新斋刻本。

[2]〔清〕永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子部六儒家·存目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9页。

[3]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64—65页。

[4][5][6]孔尚任：《桃花扇》卷三《凤凰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第184页，第186页。

[7]〔明〕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七《国门广业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8册，第558页。

[8]乾隆《震泽县志》卷三七《杂录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360页。

[9]〔明〕陆深：《俨山集》卷九六《江西家书十一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8册，第621页。

[10]〔清〕黄宗羲：《南雷文定》卷七《陈定生先生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397册，第337页。

[11]〔明〕吴应箕：《留都见闻录》卷下《时事》，第28页。

墨士胥居其中,盖文物渊薮,且良工巨商百货业集。”^[1]可见,除了乡试带来的外来人口外,商贾等其他流动人口也对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其二,乡试及其运行也促进着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南京贡院的修建就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景泰五年(1454),南京改造试院^[2],约建席舍三千余间^[3]。嘉靖四十五年(1566),时任操江佥都御史の盛汝谦,修拓南京试院,改变以前号舍的“芦苇”结构,“甃以砖”^[4]。万历五年,明廷修缮应天贡院,御史陈王道做出预算,扩建号舍“四千四百”余间,“所费不过二万余金”^[5]。可见,无论是乡试期间贡院的建造,还是其周期性的修缮,皆会消耗大量的芦席、木石料、砖瓦,对南京芦席编造、木石料开采、砖瓦烧造等业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南京乡试相关考务品购置、筵宴、试录刊刻等工作,也会消耗大量办公和饮馔器物,这也对南京造纸、印刷、家禽饲养、酿酒等业有重要的拉动作用。

总之,乡试及其带来的流动人口极大地促进了南京经济的发展、兴盛与繁荣;而南京旅店、娱乐、图书、酒馆、茶社、交通运输等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提升了南京容纳与服务外来人口的能力,为士子的备考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南京木石料开采、砖瓦烧造以及造纸、印刷、家禽饲养、酿酒等业的发展,也反过来提升了南京乡试的服务能力,为南京贡院的周期性修缮和考务、筵宴、试录刊刻等工作的顺利运转,打下了坚实基础。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

〔责任编辑:肖 波〕

The Impacts of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in Nanjing on Hotels, Entertainment and Book Business in Nan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Liu Mingxin

Abstract: The participants of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in Nan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totally amount to at least 112, 328 people 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examinees for each subject is at least more than 3209. Thus,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brought a very large floating population along with their employed servants. The large population created a host of consumption and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for hotels, entertainment and book business in Nanjing within a three-year cycle, exerting broad and deep influence on Nanji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which, in turn, provides a good material guarantee for candidates' preparation for the exams and the smooth process of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Both depend on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develop in their interaction.

Keywords: the Ming Dynasty; Nanjing; provincial examination; the number of examinees; economic impacts

[1][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二一《中城职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3册,第592页。

[2][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七“景泰五年十一月丙辰”,第5353页。

[3][《江南通志》卷九一《学校志·试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9册,第543页。

[4][清]马其昶著,毛伯丹点注:《桐城耆旧传》卷三《盛侍郎传弟十九》,〔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70页。

[5][明]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议》卷六《及时修举急务以隆治安疏(陈王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4册,第583页。